

野坂参三：在延安领导反战同盟的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 王永灿 吴耀明

野坂参三（1892—1993年），曾用化名冈野进、林哲，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40至1945年在中国延安生活了5年多，参与创建改造教育日军战俘的日本工农学校，领导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工作，对侵华日军开展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

1892年，野坂参三出生于日本，中学毕业后进入神戸商业学校学习。1910年发生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逆事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者幸德秋水等被捕遇害，这一事件对野坂参三震动很大，促使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认真研究，1911年写出《论社会主义》一文，肯定了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义”和“人道”，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1912年，野坂参三考入庆应大学，参加日本早期工会组织友爱会，成为专门从事工人运动的职业革命家。1919年，野坂参三前往英国考察工人运动，1920年7月英国共产党成立时成为首批创始党员，1921年因支持工人罢工斗争遭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1922年，野坂参三回国后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日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其间被庆应大学聘为讲师，讲授“世界社会运动”，利用讲台宣传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1931年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对中国侵略、反抗日本法西斯统治等做了大量工作。

在共产国际期间，野坂参三与中共代表团的任弼时、李立三等结识并有密切来往，从交往中，他不断增进对中国形势、中国共产党活动尤其是对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的了解。1940年初，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野坂参三随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二）

到延安不久，野坂参三发现中共抗日根据地被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包围，短时间很难从中国返回日本。周恩来和王稼祥向他传达了中共的建议，希望他能留在延安帮助做些重要工作，主要包括：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对面向前线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亲自抓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野坂参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1940年5月，野坂参三被八路军总政治部聘为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7月，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协助下，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各地反战同盟组织的领导机关，后来又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野坂参三领导这些组织面向日军发动反战和反法西斯的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10月，在野坂参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开办一所专门改造日军战俘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

三担任校长，并讲授日本问题、时事问题等科目。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学校把教育、转化学员思想作为根本宗旨，成为让日军战俘觉醒、新生的“熔炉”，正如野坂参三所说，学校办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要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先后有400多名日军战俘在此学习，使他们认清了战争的侵略本质和日军的罪恶，成为反战的中坚力量，许多学员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延安期间，野坂参三还领导“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为《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有关日本问题的社论以及介绍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专栏文章，翻译出版大量关于日本的书籍资料，为中共对日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培养了大批日本研究人才。通过在延安5年多的亲身经历，野坂参三对中共领导人和抗日根据地也有着独特的观察，他指出毛泽东“从来没有把理论当教条，他把理论总是用在实际政策的领导方针上去”“喜欢倾听农民和民众的呼声”。

（三）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在二十四

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体现着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方针，不仅指导着中国的解放，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解放的宝贵的指南针。”

野坂参三领导的反战组织工作也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43年，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1945年，朱德在七大上作军事报告时指出：“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

1945年9月，野坂参三告别中国返回日本，先后当选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长期担任日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62年3月，野坂参三70寿辰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贺电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战士”，毛泽东也亲自发去贺电，称赞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



牛：寓意和牛文化

□ 章 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牛作为与人类长期共处、相依相伴的重要动物伙伴，人们对它有比较深切的了解，赋予其广泛的寓意。我国农牧业文明发达，人们对牛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和赞美之情，由此孕育出多姿多彩的牛文化，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

据学者研究，约1800万年前出现最早牛类，随着环境变化，草原不断扩展，牛科动物不断繁盛，至今已发现的牛科动物有137个现生种和300多个化石种。最早的牛类是一种野牛，与当今的牛相比，体型更大，奔跑速度更快，性情也更加凶猛。从桀骜不驯的野牛到勤勉踏实的家牛，要归功于人类的驯化。在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伴随着农牧业的起源，野牛逐渐被人类驯化成家养的牲畜。从此以后，牛作为最常见的动物之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伙伴。

关于将野牛驯化为家牛的过程，世界各地有相似之处。在两大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的仰韶文化中均能看到已经被驯化的家牛。此外，也有一些野牛始终没有被驯化成家牛，而是成为人类的狩猎对象。与野牛相对，家牛由于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气候和栖息地，这使它逐渐成为具有经济、社会、礼仪等价值的动物之一。

在古代农业社会，牛的畜力开发引发出一场生产力飞跃的“畜力革命”，推进数以千年的农耕文明延续和社会文明进步。到了近现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器逐渐取代了耕牛的位置，牛逐渐转向为人们提供低脂高蛋白的牛肉和牛奶。当然，牛还有许多其他用处，如牛皮可以用于制革，牛骨和牛蹄可以

用于制明胶，牛黄可以用于制药，从牛脂肪里提炼出的牛油可以用于制造肥皂、蜡烛、炸药等一系列产品，可以说牛全身都是宝。

（二）

牛与人类相伴近万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把对牛的种种情感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赋予牛广泛的寓意。

牛作为人类最忠实的陪伴者，充满了对人类的温情，因而自古以来就被赋予勤劳和奉献的寓意，并因此被人们所崇敬和喜爱。尤其是在我国古代，利用被驯化的牛和铁犁耕地实现了我国农业的一次技术变革，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随着“牛耕”技术逐步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牛总是一步一个脚印，默默地开垦荒地，不停地辛勤耕耘，因此人们把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比喻为老黄牛、拓荒牛和孺子牛。

由于牛有着宽大的骨架和健壮肌肉，从远古时代起就成为力量与勇气的化身。在我国，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的炎帝就是人身牛首、力大无穷的形象，被誉为战神的神蚩也是“人身牛蹄”“头有角”。古埃及人在绘画和雕塑中，常常把牛塑造成一个太阳神，很多法老就头戴牛角帽来增加自己的威慑力。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化身之一就是公牛。在印度教神话中，牛更是代表一种伟大的力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如今，世界各国的许多体育俱乐部或体育比赛也喜欢用牛作为自己的队名或队标。

牛作为古代社会的重要生产力，不仅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畜力，也是当时人们生活物资的重要来源，常被赋予财富与地位的寓意。《礼记》对祭祀礼的规格作了记

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也就是说，只有天子、诸侯、大夫才有资格用牛作为祭品，由此可见牛在国家祭祀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古代诸侯订立盟约时，要割牛耳歃血，并称盟主为“执牛耳”，象征拥有最高权力。在古埃及神话中，丰饶及生产之神阿匹斯的形象便是一头公牛。在古希腊，有些城邦将牛的形象铸造在货币上。如今，在许多国家的金融证券公司前往往也有牛的形象存在，寓意大发利市、财源滚滚。

（三）

中国牛文化的历史渊源甚远。在原始先民的岩画中，牛就是被着重表现的一种动物。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和陶器上。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许多类似牛头的符号以及以牛作为牺牲献祭的习俗。此外，牛的艺术形象，在器皿、兵器、用具、乐器、工具、装饰品上也随处可见。

汉字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有两个用牛作为偏旁部首的汉字，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牛文化的基本内涵。一是“物”字，《说文解字》对“物”的解释为“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物”由牛而不由其它动物或植物引申而来，表明牛文化观念早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二是“件”字，从结构上就明显可以看出，人和牛是一种联系紧密、互相依存的特殊伙伴关系。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因此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牛是关乎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唐朝大臣张廷珪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古代政治家的这种想法：“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

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由于牛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此在许多朝代，牛是禁止屠宰的。直至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谈到“农民诸禁”时，仍旧强调：“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故牛是杀不得的。”

牛在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也是常客。我国古代有关牛的成语典故、诗词歌赋等数不胜数。成语如老牛舐犊、汗牛充栋、多如牛毛等。牛作为十二生肖的传说故事流传至今，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也是妇孺皆知。《诗经》中的《无羊》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牛羊繁盛的场面。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著名诗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咏牛诗。南宋李纲的《病牛》则通过表现牛的不辞劳苦与奉献精神，表达自己忠心国家、报效众生的信念。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对联，更是家喻户晓。

牛与中国文化的密切联系，还体现在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中。远古牛崇拜的种种形式，有许多流传下来，成为今天的节日或习俗，如牛王节、洗牛节、斗牛节和鞭春牛、送春牛等。

总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和牛结下了深厚情结，牛文化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今天，我们了解和传承牛文化，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年出生，瑞典著名语言学家，涉猎广泛、著作等身，研究领域涵盖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可谓是瑞典汉学研究的开山人物。高本汉的中文名是自己所起，他常操一口纯正的山西腔自我介绍：“我姓高，名字叫高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嚟！”这简单明了、铿锵有力的身份认同直接体现了他对中华文明的深沉眷恋。

（一）

高本汉出生于瑞典中部城市延雪平，他的父亲、哥哥、妹妹也都热衷于语言学研究，家庭环境给高本汉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的内心自小便燃起了研习语言的火苗。延雪平高级中学的卡尔·列毕、瓦尔特·菲舍尔两位老师发现并唤起了高本汉对语言科学问题的兴趣。1908年、1909年瑞典知名刊物《瑞典方言和瑞典人民的生活》先后刊发高本汉《特维达和莫县的民间故事》《瑞典南部和中部方言的界限》两篇文章，让学界开始认识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高本汉曾两次造访中国开展方言调查。1910年，他首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学习了两年。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方言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及华北地区，详细收集了有关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的12至15种方言，为他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方言也成了重构汉语古音的宝贵资料。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他还为《每日新闻》撰写了系列报道传播中国的社会风貌与百姓生活。1911年高本汉受聘于太原大学堂讲授法文、德文、英文课程，同年11月离开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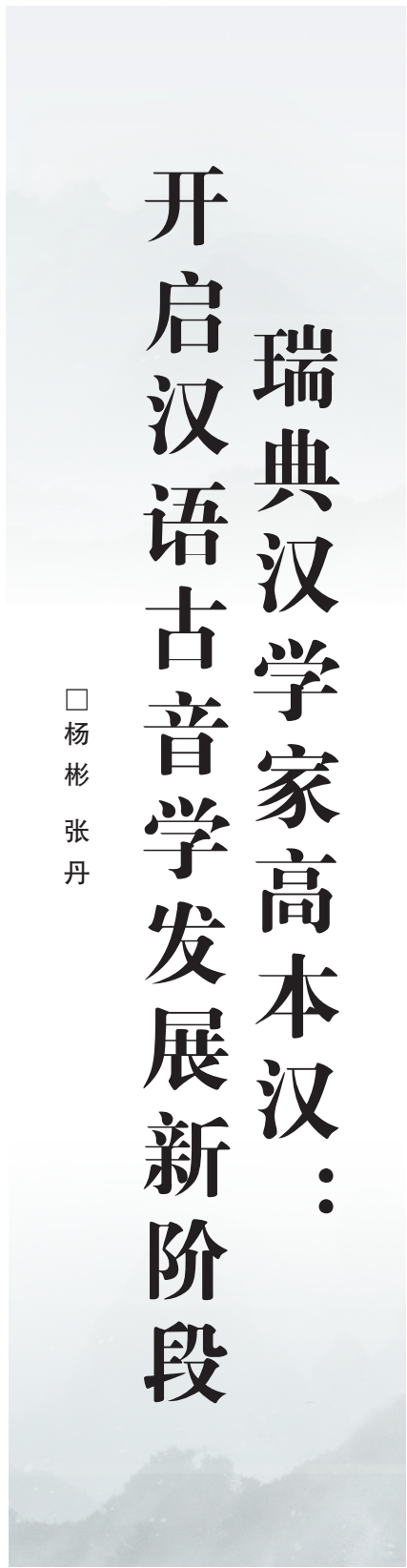
1912年，完成第一次中国之旅后，高本汉将研究工作转至巴黎，并在法兰西学院旁听“欧洲汉学泰斗”沙畹的课，内容涉及中国历史人物、宋代文学以及《诗经》《春秋》等典籍，他对老师充满了崇拜与敬仰，并为其严谨治学、审慎把稳、勤勉不懈的科学精神所打动。在师生的良性互动中，高本汉获得了一次次自我提升的机会。在沙畹之后欧洲汉学界分化为巴黎派与瑞典派两大支脉，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他的门生，“巴黎派”以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为主，“瑞典派”中以高本汉为主要代表人物。

1922年，时任哥德堡大学东亚语言和文系系教授的高本汉再次开启了远东之旅，仅在上海停留数日，便借道横滨，驶向东京。

（二）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1915年5月20日，他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次日便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答辩内容受到考官们的一致好评，并建议授予他汉语副教授职位。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里，前388页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东方研究文集》第15卷。书中选取最常用和最具代表性的3125个字作为方言调查字表，搜集了多种方言材料，以及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并对比这些字在现代不同方言中的读音，构拟相应音值。他一改顾炎武、段玉裁、王念孙等传统音韵学家“以反切法按照韵图推求古音”的做法，引入注音字母、重视音节和音系的结构分析，从现代方言和外国语言借音中考察古音遗迹，在中西理论间的激烈碰撞中激发前所未有的能量，这一创举开启了汉语古音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西学东渐”时代大环境下汉语音韵学保持生机、延伸研究空间的必由之路。该书的面世对中国的方言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被汉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共同翻译为中文版本，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白滨洲等发起的全国方言调查活动也以此为基础，并对西南地区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填补。

1920年，高本汉给《亚洲学报》投稿一篇长文《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文章以实例论证了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具有“格”的变化形式，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轰动。长久以来语言学界公认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代表语言，其类型为孤立语，特点之一便是缺乏形态变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范畴。高本汉的观念严重挑战了传统认知，使以英语为代表的黏着语与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不再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印欧语的发展表明“最初属于主语的领域已经为宾语字所侵入”，高本汉通过查阅第一人称代词“吾、我”以及第二人称代词“汝、尔”，在《论语》《孟子》《左传》中的出现次数及充当句子成分情况，证明了这种现象在古汉语中也是存在的。如作为宾语形式的“尔”可以以主语和所有格的形式出现，与其相对的“汝”则没有该使用倾向。这种变格区别理论在更早



□ 杨彬 张丹

的传世文献《书经》《诗经》中未能得到验证，高本汉解释这些作品由当时各地的方言书写，早已遗失无从考证。

（三）

高本汉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注释也是其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他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上依次发表了《国风》《小雅》《大雅》《颂》的注释共1206处，写满了637页四开纸，合集为《诗经注释》，这是利用语言学训诂古书的一部名著，1960年由著名学者董同龢译为中文在台湾出版。“读经必先识字”的传统方法已经深入人心，高本汉进一步提出应尽量汇集诸家的异文，运用现代语文学的知识和方法客观地求得许多难字难句的实际意义。他的突破主要在于“不主一家”，如他处理假借字问题非常谨慎，主张不“轻言假借”。被清儒看作假借关系的，他则认为是一个“词群”中的字，并指出“中国语的同音字很多，如果漫无节制地谈假借，简直可以把一句诗随便按自己的意思去讲，那就不足为训了”。此外，他也提议各篇的相同词语可以合并讨论，如“被之祁祁”（《召南·采芣》）、“兴雨祁祁”（《小雅·大田》）、“祁祁如云”（《大雅·韩奕》）、“采芣祁祁”（《豳风·七月》）、“来假祁祁”（《商颂·玄鸟》），彼此互相参照能够解决很多繁杂的语义问题。

高本汉的汉学造诣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汉语词组》中讨论有亲缘关系的各种词类活动的框架，《中国古籍的真实性》中提出依据语法系统的某些特征判断典籍的无法复制性，勘定青铜器年代时力主重点考虑以器物的造型与其上的饰纹为依据。诸多贡献都为瑞典汉学研究独立成一个专门的学科起了决定性作用。

高本汉将传统音韵学研究领域比喻为“一片沃野”，足见这位学者对中国语言学刻骨铭心的挚爱。1978年他与世长辞，其汉学研究成果为后世学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他的弟子们包括将欧洲汉学研究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马悦然，凭借名著《汉字王国》《古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的林西莉等，继承了他的志趣，将高本汉的汉学研究进一步传扬。

